

# 一本很好的书

陈四益

几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本书——一本很好的书。记者写书，过去有过，现在也有，而且越来越多，不足为奇，因为这职业本来就是时代的记录者。记者的书，有的因其采访对象多为要人、名人，闻见所及，每关重大事件，凡有记录，均成史料；有的因其游历殊域，见闻多奇，无缘亲历者，读之可以增广识见；有的观察入微，见解独到，剀切之言，卓然名家；有的虽事皆琐屑，每多趣闻，茶余饭后，足资消闲破闷。林林总总，各有价值。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正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转型期中，其生存环境、生存状态，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变动当中，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多样的变化，已经消失的或又有孳生，趋于和缓的或又呈紧张，先前激烈的或渐次平缓，原先忽略的或日益突出。准确把握这些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以求社会的和谐发展，即所谓燮理阴阳，调和鼎鼐，是执政者的要务。因此，官员们不但要阅读下级的种种汇报、请示、总结、调查，还要自己直接考察有关情况。但新闻记者，因其职业与身份的方便，对社会各阶层的调查与观察，往往有政府官员所不能及的方便。他们关于社会状况的报告，也有官方各种总结、汇报所不可及的优长。政府派员下去了解情

况,往往先要(有时只是)听取下级政府的汇报。下级官员的汇报,因为关系于自身的地位与利益,很难和盘托出。百姓的意见、实际的情况,经过一番过滤与选择、淡化与突出,数字真真假假,情况虚虚实实,虽不一定是无中生有,也总同现实拉开了距离。距离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干部作风的好坏。单凭这些材料,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上级官员一竿子插到底,自己直接到基层考察,当然要比只听下级官员汇报距离实际近一些。然而,大官下基层,往往处于包围之中。下级安排给上级看的,是他希望上级看到的。因此,选点总是面上光鲜的所在。我就知道有的地方,上面来了人,看的总是那几个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道路宽阔平坦,两侧绿树成阴,新楼成群。这是他们的“形象工程”。参观计划早有安排,接待办法早有布置,汇报人员早有选定,甚至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也早经排演。只看这些,自然到处莺歌燕舞,一片光明,但也就不免入其彀中,得不到真实的情况。鲁迅当年曾想写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见鲁迅《扣丝杂感》)。足见此事之难。有效的脱离包围法,至今仍未见完整的著述,但脱离的尝试,已有不少试验。精明的领导,为了突破包围,有时会突然离开规定的参观路线,径自到了样板后面的地方,内里的馅儿就露了出来。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屡试。一则容易引起下级的反感;二则用多了,也就有了应对的方法——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过,今天的社会毕竟不同于鲁迅生活的年代。信息化的进展,使信息渠道剧增。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包围的效果就越小。领导人、决策者,如果不是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死官僚,完全

可以依据不同渠道的不同信息,加以综合、比较、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对实际的认识比较接近于真实。

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记者的观察与记述很值得重视。记者不是官员,他比较容易摆脱官场难以回避的某些程序,因而较少包围的危险。记者有职业的敏感,能够抓住繁杂社会现象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不至纠缠于一些枝节细事。记者不同于学者,他并不试图对所见现象作抽象的概括或建立某种理论框架,因此更容易保存社会现象的原生状态,而这种原生状态对于了解实际情况,往往比经过加工改造的材料更为重要。记者有文字的训练,所记所述,条理清晰,活泼生动,读来较有兴味。当然,并不是所有记者的作品都能如此。那些以跑衙门为能事的记者,那些以稿件换取私利的记者,那些对社会没有责任心的记者,那些不肯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的记者,是写不出有价值的好作品的。我推荐的这部书,具有上述记者作品的各种优长。它探讨的是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群体——民工——的生存状态。问题之重要,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不仅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前景,而且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安定。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十分强调农业的重要。重农,几乎是历朝历代的国策。但是,历朝历代农民的生活却始终处于贫困的状态。我们常常称道所谓“文景之治”,但文景时期的晁错,仍在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治世尚且如此,何论乱世!流亡的农人无以为生,铤而走险就是唯一的选择。古代中国独多农民暴动,社会安定的时期少,动荡的时期多,同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分不开的。当代中国仍然十分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的措施采取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改善依旧未能尽如人意。姑不论

制度、政策、组织上的种种失误，但说把八亿多人口死死地拴在人均数量极少的耕地上刨粮食，农民要富裕也就难矣哉了。1980年代初，我到珠江三角洲看过，那时的对外开放，还刚刚开了一条缝，乡镇开始有了一些小打小闹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主要做些来料加工的活计。少量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做工。不料没过多少年，农民进城打工已达一亿多人。汹涌澎湃的民工潮，还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动。据研究者估计，还会有两三亿农民在今后若干年里涌入城市。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不但减轻了农村的负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国农民生存状况有了改变的可能，也使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外资的大量进入，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没有这些吃苦耐劳而所获甚薄的劳动力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工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甚巨，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并不理想。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城市中最苦最累的，而收入却很微薄，这微薄的工钱还常常被拖欠。以此微薄的收入要在花费高昂的城市生活，本已十分拮据，而他们还要积攒起钱来维持和改善农村家人的生活。因此，在城市中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准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他们的居住条件往往是城市中最差的，基本的卫生保健没有切实的保障。我在北京看过一些外地民工聚居的“村落”，拥挤、破败、脏乱，是共同的特点。替他们看病的，是同样从外地来的“游医”，药品大多是从享有公费医疗者手中转买来的剩余的或过期的药品。首善之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他们的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城市学校的大门，并不向他们平等地开放。他们的婚姻、家庭、性生活也同样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还有更为难堪的，是他们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不应有的伤害。社会的歧视，渗透在生活的各个细部。尽管他们进城打工都有合法

的手续,但往往会受到非法的刁难和驱赶。总之,他们应当成为城市居民平等的一员,但实际上常常被当作另类。这些,几位记者的笔下都有详尽的描述。有些人轻浮地贬斥他们的道德水准,这中间许多是某些自以为“上等人”的优越和偏见,即便在这个群体中确实存在某种道德的失范,社会应当考虑的也是怎样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因为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生存环境与教育环境的影响。农民进城打工,仍将继续。没有民工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城市,离开了民工甚至已无法运转。

民工问题,不是一个民工待遇的简单问题。它关系于经济,关系于稳定,关系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关系于全民素质的提高。现在是一亿多,未来是三四亿。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的战略转移,万万不可轻忽。我喜欢这本记者的书,因为它有材料,有分析,读后有启发,有感动。关心于社会现状与未来的人,都值得读一读,然后再想一想:为了民工,社会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又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 目摇摇录

第一章 摇摇新二元结构 .....	1
摇摇民工为什么替老板撒谎? .....	2
摇摇民工的名字 .....	7
摇摇一种叫“民工粮”的米 .....	10
摇摇我要回家 .....	18
摇摇被妖魔化的民工 .....	29
摇摇被收容的“民工作家” .....	34
第二章 摇摇跳, 还是不跳? .....	41
摇摇追踪民工的一百一十五天 .....	42
摇摇血薪 .....	50
摇摇民工讨薪难在哪? .....	56
摇摇总理掀起全国讨薪高潮 .....	60
摇摇“廉价劳动力”一定就是竞争力吗? .....	65
第三章 摇摇保姆周岱兰 .....	70
摇摇保姆坠楼, 三方困境 .....	71
摇摇生不如死 .....	73
摇摇周岱兰成了“现象” .....	75
摇摇漫漫长夜 .....	77
摇摇周岱兰站起来了 .....	79
摇摇社保空白 .....	83
摇摇侥幸与冷淡 .....	85
摇摇“保姆荒”的背后 .....	87

摇摇周岱兰们有了“保姆险” .....	91
摇摇“赤条条”地打工,沉甸甸的顾虑 .....	93
摇摇“民工社保”难在哪里? .....	95
摇摇工伤保险:最迫切的需要 .....	99
摇摇民工需要什么样的养老保险 .....	101
第四章摇摇终于在城市放下我的书桌 .....	104
摇摇民工子弟——教育市场的另类生存者 .....	105
摇摇草根校长臧德阔 .....	113
摇摇民工子女上学缘何难? .....	120
摇摇融合教育 .....	127
摇摇让流动儿童共享“德育”蓝天 .....	132
摇摇新华社的调研 .....	139
第五章摇摇性与爱 .....	143
摇摇一份叩问心灵情感的问卷调查 .....	144
摇摇“空虚寂寞是进城打工的最大感受” .....	147
摇摇真感情难觅,性压抑难熬 .....	151
摇摇道德危机正在降临 .....	162
摇摇创建新“阵地”,弥补精神空白 .....	168
第六章摇摇罪与罚 .....	172
摇摇当代阿 Q .....	173
摇摇“劫匪”张隆 .....	178
摇摇三条人命 .....	182
摇摇扼杀骨肉 .....	187
摇摇为情所困 .....	191
摇摇帮助民工拿起法律武器 .....	194

第七章	摇摇留守子女与女人	198
	摇摇悲剧	199
	摇摇书信	203
	摇摇缩影	209
	摇摇调查	217
	摇摇留守女人	227
第八章	摇摇另一种生存	236
	摇摇铁杖恶丐	237
	摇摇“城管”被乞丐“欺负”	242
	摇摇“请吝啬你的每一元钱”	244
	摇摇禁乞之争	247
	摇摇严打“帮主”	248
	摇摇谁也没有天生乞讨癖	250
第九章	摇摇和谐城市摇摇人的中国	253
	摇摇有尊严地居住——对东沟岭的调查	254
	摇摇有尊严地居住——对桃苑村的调查	257
	摇摇工会,民工在城市的“娘家”	263
	摇摇民工党员:离土离乡不离党	269
	摇摇民工,中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	277
后记		284

# 第一章 摇摇新二元结构

摇摇很多年过去了，未来的日子又如潮水般涌来。曾经炽烈的情感，渐渐淡如白水；一度梦寐以求的，无论得到了，还是没能得到，最终付之一笑……时间是最有魔力的大师，让人感慨，让人无奈，更让人淡忘。

但有些故事有些人，却永远无法让人淡忘，时光冲刷着记忆长河，泥沙俱下，最终能够留下的，总是这么一类永恒记忆，温暖，或者刺痛你的灵魂，于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都是如此。

在中国，这十几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在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价值观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传统乡土中国瓦解……尤其是一亿多民工，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这史诗一般波澜壮阔的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中，多少裂变震荡、多少挣扎沉沦、多少梦想幻灭、多少生死悲欢！

他们，绝不会是没有历史的人。

## 民工为什么替老板撒谎？

“如果矿工因公死亡的，龙山矿一次性补贴死者家属两万元，龙山矿不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責任。”

当这样一份“生死契”摆在面前的时候，新华社记者肖春飞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心灵为之颤抖”的滋味。

这份名为“民工上岗协议书”的非法合同签订于2001年5月24日，是一名三十八岁的矿工韦海生与矿主签订的，韦海生在这份协议书上摁下了鲜红的手印。两个月不到，韦海生和他的儿子韦灿军，双双在震惊中外的南丹“7·17”矿难中丧生。

7月17日凌晨3点30分，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龙山矿海拔-150米的巷道里，八十一名矿工，瞬间在一场并非偶然的透水事故中丧生。当死难者含冤躺在黑暗的矿洞深处时，地面上，个体矿主与地方官员勾结，一方向下“封口”，一方向上瞒报，用金钱与权势炮制出了一个弥天大谎。

作为这个弥天大谎从编织到破灭整个过程的见证人之一，肖春飞深刻体验到了属于民工的另一个世界的残酷、悲苦与无奈。

八十一名死难矿工，绝大多数是来自贵州独山、荔波和广西都安、宜州的大山之中的贫困农民，矿难之后，公安人员为了寻找一个死难者家属，往往要在大山里头走上两天两夜。而在公安人员调查之前，矿主指派众多手下，身负巨款，迅速赶到各死难者家中慰问，并把死者家属接到秘密地点，协商赔偿事宜，“超常规”给每名遇难者家属五万元到六万五千元不等的赔偿，并威胁：有人来问，不要乱讲，如果讲出去，什么困难都不帮解决。

韦海生是广西宜州市德胜镇都街村农民，村里有四人在南丹“7·17”事故中丧生，除了韦海生、韦灿军父子俩外，还有韦海生的姐夫韦振平和另一位村民覃文体。

7月20日，龙泉矿冶总厂总经理黎东明派小舅子黄国亮等把死者的家属接到金城江河池中学对面的华林酒店，分别协商抚恤金问题，当天韦海生的妻子韦美丹得到十三万元，韦振平的妻子得到五点一五万元，覃文体家属得到五万元，并被告诉说回去后不许乱讲。7月30日，龙山矿儿人来到村里，拿了苹果、烟酒，并对死者家属说：“有什么要求，可以向矿里反映，

千万不要跟记者说，如果曝光出去，矿井被封了，你们就找不到尸骨了！”

在韦海生简陋的家中，韦美丹捧着丈夫、儿子的相片，与年迈的婆婆整天抱头痛哭。在绝望中，她们只能借酒消愁。后来，新华社记者与矿难外围调查组来到她们家时，看到屋里六瓶已被喝干了的、龙山矿送来的“沙河王”酒……

在这次矿难的采访中，新华社记者的电话被窃听，汽车被跟踪，还遭到过不明身份的人的威胁，自治区政府不得不专门派出干警保护他们，手枪二十四小时不离身。他们看到在地下矿洞中摄氏 50 度的污水中一点点腐烂的民工的遗体，面目已无法辨认，家属在矿旁搭起了灵棚，等待亲人的遗体背上地面；他们也看到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个个漏出马脚，一个个锒铛入狱，当时的南丹县县委书记万瑞忠在矿难调查进行时，一天天消瘦下去，直至被“双规”、正式逮捕，一年多时间后被执行死刑……但是最让他们震撼与深思的，却是那一群知道同乡甚至亲友死难真相的民工，一再向调查组和记者隐瞒——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知道”。

在通讯发达的年代，在拥有数万矿工的南丹矿区，在离矿难发生地不远的南丹县城，再加上八十一条生命的亲属，以及死里逃生的几百个井下作业民工，“7·17”矿难为什么还能被隐瞒上十五天？

矿主说谎，官员说谎，民工也说了谎。

在发生事故的拉甲坡矿区，无所事事的矿工们住在石棉瓦或轻体砖搭建的简易宿舍中，手上似乎是永远洗不掉的黑污，打麻将、看电视，或者闲坐着，看着记者走过来，记者在哪个门口停下问话，就会有人围着看，最多的时候，身后有二三十人——后来，才知道这里面有矿主的“耳目”——他们围着，表情漠然，一问起知不知道有事故发生，他们的回答惊人一致：“不知道，我是刚来的。”

自治区调查组找了很多矿工问话，开头的話就是“你说的话要负法律责任”，回答完之后，还要摁上手印。但是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我是刚来的”、“没有伤亡事故”。

随着调查的深入，才知道，矿主除了紧急以钱封住死难者家属的嘴外，还收买或警告过矿工们，“不要乱说”。

7月26日，受黎东明指使，矿山中层管理人员韦家农、黎家西等人找来一批矿工，给他们每人三千元钱，要求他们：如果有人来问，就讲没有发生事故，没有人死伤。次日，韦家农还进行了抽查，对他们的表现很满意。

7月27日，龙山矿在抽水时发现两具死难矿工尸体浮出水面。龙泉有

关人员及两名民工悄悄将尸体连夜拉到外地火化，事后给每个民工三百六十元，交代他们不要泄露。

7月31日，黎东明打电话给黎家西，指示他赶快想办法转移从矿难中出来、还在南丹住院的伤员。黎家西等人连夜赶到南丹县中医院和县人民医院，动员并出钱购买伤员出院、离开南丹，交代他们不得跟其他人讲发生了事故，并威胁说如果乱讲就不发工资。

.....



江苏盐城，民工在黄海上修筑大桥。杨金志摄。

调查组与记者期待中的民工纷纷站出来控诉矿主的情景并未出现，相反，劳资双方还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制造谎言，一个维护谎言。

肖春飞清楚记得，调查组中一位老干部对民工的搪塞与麻木痛心不已，他在一个又一个民工面前碰壁，一筹莫展，叹息说：“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才行！”

他的意思是，要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宣传矿主的压榨与剥削，让民工们“恍然大悟”，一个个勇敢地站出来揭发矿主的恶行。

但还是没有人站出来。

突破口最后并不是从民工一方取得的，而是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支持不住了。8月2日下午5时50分，在公安人员凌厉的心理攻势前，前一天还挺胸脯保证没有死人的黎家西败下阵来，竹筒倒豆子一般承认了“7·17”事故的经过，并交出了失踪者及赔偿名单、住址。他供认说：7月17日凌晨3时30分左右，拉甲坡矿海拔-150米水平以下的三号工作面、八号工作面以及九号工作面突然涨水，迅速淹到海拔-110米水平，当晚拉甲坡矿的260名矿工分别在八个工作面作业，其中约有八十名左右的矿工在被淹的三个工作面作业，除部分管理人员和九号面部分未下到工作面的矿工外，其余均失踪。

交代完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出来，就轻松多了。”

此时距矿难发生，已经半个月了。

如果说矿主用钱、官员用权编织了弥天大谎，那么作为受害者一方的民工为什么也说谎呢？

只能说是迫于生计压力。

在龙泉矿冶总厂，矿工平均每天能拿到六十多元的报酬，具体计算方法是计件，每天采矿达到二十五筐得二十五元，而此后每增加一筐即增加三元，这样一个月下来有近两千元的收入。

这两千元绝对算得上是血汗钱——民工们的矿洞工作环境之恶劣，超乎常人想象。8月1日15时，为了寻找疑点，时任新华社广西分社副社长的杨维成作为自治区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带领两名记者与调查组一起进入拉甲坡矿矿道。大家在二三十公分深的泥水中艰难行进，花了两个小时，前行三千米，再也坚持不下去，只能退出——矿内空气稀少，湿度达到100，温度接近摄氏40度。撤出时，一位同志因脱水被抬出来。事后，矿山专业抢险队的专家责备他们过于鲁莽，没有带任何防护装备就深入矿洞，这位专家说，如果再深入一些，体质差的就可能倒在里面，不能活着出来了。

不能想象，工人们怎样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干活。矿工说，他们在井下几乎裸体，实在热得不行，就跳到脏兮兮的水仓里泡一会儿，而水仓的温度也不低于体温……

虽然苦不堪言，但两千元这个数字对南丹及其周边生活在喀斯特大山中的农民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八十一名死难者多数来自贵州独山、荔波和广西都安，这三个县均是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按2000—2010年国家级贫困县的标准，“入选者”人均年收入低于一千三百元——也就是说，如果在矿山干上一个月，就可以超过在石头山中种田一年的收入。

韦海生的家是三间低矮的泥瓦房，破旧不堪，家里除了一台十七寸的旧黑白电视机外，根本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

韦美丹说，她原来并不想让儿子去挖矿，但眼看村里的人都盖起了楼房，就同意韦海生、韦灿军爷俩去，儿子才十八岁。

调查组与记者采访时，都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矿工们对矿主没有太大的抱怨。

新华社记者问韦美丹，矿难发生后为什么不告发矿老板？韦美丹说：“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人死都死了，矿老板也作出了赔偿，告他有什么用呢？又不是矿老板故意弄死他们，挖矿这种事，谁不知道有危险，可是没办法，由于我们农村人穷，不去挖矿不知干什么好？”

对这个贫困的女人来说，别说十三万元，此前，她连两万元都没见过。两万元，这是“生死契”上民工自愿接受的价格，换句话说，这是民工对自己生命的估价！

劫后余生的矿工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今后打算，异口同声地答道：“继续下井。”

韦海鸥是韦海生的弟弟，7月17日，他跟兄长一起在井下干活，两人同在一个班组，由于他所处地势比韦海生高，得以死里逃生，他回忆说：“凌晨3点50分，我看到大量的水涌入，水是从拉甲矿方向涌过来，不到一分钟，第二工作面已经灌满了水，并顺着斜道向第二平台涌上来，我想去救下面平台的亲属，已经来不及了，就和同在第二平台的两位工友拼命往外跑……”

逃过大劫的韦海鸥几天来都在矿洞前徘徊，一来是打探兄长的消息，二来等着矿洞重新开工。

几乎所有的民工都是这种心态，他们并不太在乎矿难，他们更在乎的是矿山何时重新开工，“只要开工，我们马上就干！”

他们为矿主保密，不惜对“大盖帽”说谎，一方面是因为矿主的威胁，另一方面，却是这种心态：如果上面知道事故情况，企业被查封，大家都要丢饭碗……

贫困就这样让身处社会底层的民工们的生命价值如此“贬值”，哀其不幸，更要哀其不争——农民身份与经济贫困决定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两万元一条命，极其不平等的一个公式，但他们凭什么去跟“定价者”讨价还价？

## 民工的名字

本名: 民工  
小名: 打工仔/妹  
学名: 进城务工者  
别名: 三无人员  
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  
昵称: 农民兄弟  
俗称: 乡巴佬  
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 公民  
家族封号: 主人  
时髦称号: 弱势群体

**摇摇**这是诗人刘虹的作品《打工的名字》中的 A 篇。民工的十五个名字，隐含着—个时代和历史，还透着多少民工的辛酸故事？

“民工”—词，源于何时已不可考，词典解释的“民工”，是战争时期帮助军人进行运输工作或者修建军事设施的农民。新华社在 1948 年 1 月 6 日播发的一篇题为《晋冀鲁豫边府颁布施行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中，首次出现了“民工”—词：

“十一、大纲第十条（丙）项之补充：（甲）凡自抗战以来在前线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包括人民解放军军人、民兵、民工及其他人员），本人仍应与农民分得同样—份土地和财产。”

在那个年代，“民工”—词，是—个跟战士、民兵—样受人尊敬的称呼，1948 年 1 月 23 日播发的一篇题为《—年来山东人民支前工作》的新闻稿，是这样写的：

“山东人民在过去—年内不断以高度的积极性支援前线，帮助解放军

连续获得胜利，记录下人民战争的伟大一页……民工们在转运伤员时，一路上拿自己的饭瓢给伤员盛大小便，出钱买鸡蛋、白糖给伤员吃，遮风雨、赶苍蝇，用尽一切办法照顾伤员。五月上旬孟良崮歼灭蒋匪七十四师时，几十万民工历尽千辛万苦，克服各种险阻，大家都以能参加这次胜仗为极大光荣……当陈粟大军转入外线反攻时，大批民工随军出征。另有大批民工则随许谭大军活跃胶东前线……在英勇艰苦的支援工作中，参战民工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了，荣获‘钢铁担运队’的莒（县）南参战群众，已有七百名队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另有大批队员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蓬勃开展，“民工”一词，又成为与工人一起参加铁路、水库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农民的称谓，劳动者光荣，这也是一个受人尊敬至少是中性的称呼。

但是在今天，这两个字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既非农民又非工人。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但被看作农村人；他们干着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汗水洒遍了城市每座或豪华或典雅的大楼，但他们却一次次在“乡下人”的鄙夷声中让心跟着身体一起累；他们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城市，让中国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以极低廉的成本获得了极惊人的速度，但他们年老力衰时，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甚至辛辛苦苦一年干下来，连工钱都拿不到……

身份的模糊决定了身份的尴尬与低下，“民工”两个字，就像他们以前曾经有过的另外的名字，“盲流”、“三无人员”，“打工仔”、“外来妹”，透着赐名者深入骨子里的蔑视。

在中国，“民工”两字已不仅仅从中性的职业界定转化为贬义的身份界定，更成了像“小姐”一样被毁得一塌糊涂的名词，堪称现代汉语的一大奇观。“你怎么像个民工似的？”“你真是民工！”……衣冠不整、没有格调、品位低下……统统可以用“民工”二字来形容，甚至吃饭的姿势、穿衣的配色、说话的口气，稍有不慎，都会招致“民工”一词的攻击；就是担负着社会公正责任的报纸，也不时会在法制或社会版上出现这样的文字：“民工模样……”

北方城市，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民工进城，腰缠麻绳，夯门不按门铃，看球不知谁赢，买水果先问啥名。”

离开没有门铃、足球还有形形色色洋水果的传统乡土社会而进入城市、进入“民工”这种贬称中辛劳求生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的统

计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民工数量为六千万人，1999年达八千两百万人，2000年达八千八百四十万人，而到2003年，已有一点一四亿人。十年之间，农民工的人数翻了一番。事实上，这是一个仍在不断增长的数字。

上溯两三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祖父、曾祖父辈都是农民。后来，分化开始，中国人被二元体制分割开来，花开两朵，各自开枝散叶，本是同根同源，然而越来越陌生，有一朵被优待，慢慢看不起另一朵，甚至说它不是花，是草。

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它还意味着经济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和社会身份。

在中国，市民和农民相区别、城市与农村互相隔离，城乡二元结构，举世罕见。一纸户籍，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法律……各个领域将人们分割开来，区别对待——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医疗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人才、燃料、生产资料供给、粮食销售、住宅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在人均财产方面，城市人是农村人的二十到三十倍，在人均收入方面，城市是农村的六倍，排名世界第一。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国家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挖农补工”，人为地制造“剪刀差”，使农民艰苦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

据一些学者测算，建国后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三十年左右时间里城市从农村“积累”走至少八千亿人民币。而最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积累”走了两万亿人民币。很多学者因此喊出“反哺农村”的口号，另一个相同的观点是，进城农民，是有助于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二元结构，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因素稳定和强化这种“城乡分治”的结构，也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困。农民进城务工是撕开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缺口”，是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

人们把民工经济比喻为“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城，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民工经济一头连着农村经济，一头连着城市经济，不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